

冷戰初期殷海光的「抗俄」邏輯

何卓恩

摘要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後，面對蘇俄的共產主義與英美的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冷戰格局，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意識分別呈現出反美論和抗俄論兩種類型，殷海光是抗俄論說中比較活躍的一個。殷海光抗俄論的第一個階段是抗戰勝利初期的抵抗「蘇俄入侵」，第二個階段是到臺北之初的反抗「布林希維克主義」，第三階段是國民黨改造完成之後，抗議一切「極權政治」。時間上的三個階段，同時體現為邏輯上的三個層次，既顯示了與國際冷戰意識形態的接軌，又彰顯「西方陣營」內部思想的複雜性。

關鍵詞：冷戰初期、知識分子、殷海光、政治意識、抗俄

“Anti-Russian” Logic in Yin Haiguang’s Thought in the Early Cold War Era

Zhuo-en He^{*}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world’s Anti-Fascist War (i.e., WW II), Chinese intellectuals, fac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of a Cold War between Communism of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one hand, and liberalism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other, formed two opposing camps in their political ideas: the “anti-American” camp and the “anti-Russian” camp. Yin Haiguang wa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latter. The development of Yin’s anti-Russian theory went through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objection to “Soviet invasion” shortl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second phase by a rejection of “Bolshevism” upon Yin’s arrival in Taipei, and the third by denouncing any form of totalitarianism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Kuomintang in Taiwan. These three phases represent three logical levels that suggest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Yin’s thoughts and international ideological trends in the Cold War,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political ideas within the “Western camp”.

Keywords: Early Cold War, Intellectuals, Yin Hai-gua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ti-Russian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冷戰初期殷海光的「抗俄」邏輯*

何卓恩**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蘇俄的共產主義與英美的自由主義聯盟，徹底顛覆了德義日極端民族主義。但戰火方平，硝煙已起，同盟國兩派勢力爭奪世界主導權的爭鬥旋即出現，表現為蘇俄支持的共產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在全球勃興，英美自由主義勢力則有組織地針鋒相對，展開對蘇俄的圍堵，對各地革命的遏制和對蘇俄所控制國家的和平演變。儘管在世界各地雙方的代理人戰爭不斷，蘇俄與英美之間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直接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以蘇俄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之間這種既尖銳對立，又不訴諸武力的形勢，被稱之為「冷戰」。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後被無情地納入冷戰格局中，並且先後以國共內戰、海峽兩岸對峙的形式展現著冷戰的特質。冷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識主要有反美論和抗俄論兩種類型，反美論以認同中共路線的知識分子為主，抗俄論以追隨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為主。知識分子關於冷戰雙方的考察，成果頗豐，主要集中在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領域，如《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

* 本文原係為「冷戰時期的知識分子」學術研討會準備的交流論文，2019年12月5日為殷海光先生誕辰100週年，特投稿《國史館館刊》以為紀念。感謝《國史館館刊》編輯委員會和三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也感謝五邑大學通識教育學院教師柳恒博士在武漢封城之際協助我對論文所作的修訂。

收稿日期：2019年12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3月16日。

**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關係》、〈冷戰後的國際格局博弈與中俄關係的發展邏輯〉、〈中亞博弈：冷戰後的中美俄關係〉等。¹ 關於冷戰時期知識分子心態的研究，成績亦相當顯著，如薛化元的《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郭齊勇的《錢穆評傳》、歐陽哲生的《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等。² 但是以上研究不是側重在對冷戰雙方的政治學考察，就是側重在知識分子的思想研究，很少有人把知識分子研究跟冷戰的情境聯繫起來。本文將以這一時期比較活躍的政論家殷海光（1919-1969）為例，試圖在冷戰的背景下來觀察中國流徙知識分子政治意識演變的某種軌跡。

貳、抵抗「蘇俄入侵」

殷海光的抗俄論在冷戰之前即已隱約出現，這跟他對中共的認識和態度有關。抗戰剛剛結束，殷海光從青年軍復員，在重慶求職之際，寫有《光明前的黑暗》、《中國共產黨之觀察》等書，稱戰後中國面臨的是「共產黨問題」，而中國共產黨是蘇俄主導的共產國際的延伸，「一九二八年以還，共產國際不復是為了全世界的人民而存在的組織，而是為了擁護俄國一國的利益而存在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有保衛無產階級的司令塔的神聖義務！」³ 將中國共產黨視為蘇俄國家利益在中國的代言人，為了俄國這個「無產階級的祖國」，必須「堅決執行有利於俄國的政策，而排斥自己國家之有害於俄國的政策」。⁴ 這一認識在殷海光進入國民黨宣傳系統之後，得以充分

¹ 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萬青松、王樹春，〈冷戰後的國際格局博弈與中俄關係的發展邏輯〉，《當代世界》，第11期（2018年11月）；高飛，〈中亞博弈：冷戰後的中美俄關係〉，《外交評論》，第2期（2010年3月）。

² 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郭齊勇，《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³ 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5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26。

⁴ 殷海光，〈中國共產黨之觀察〉，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5卷，頁123。

表述。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不久，殷海光開始為《中央日報》撰稿，後來正式成為主筆和「管主筆的主筆」（主任主筆）。他的寫作重心都放在從思想理論上去剖析各種政治勢力和局勢發展，而「共產黨問題」一直為重中之重。1947年5月他發表〈共產國際的世界政策〉、〈革命與暴動〉等文章，當時內戰已起，他把中共的「解放戰爭」說成是共產國際世界政策的實施，把中共說成是「在祖國裡執行外國政策的一個工具」，⁵是為俄效力的共產國際第五縱隊中「最有聲色的一個」；他說，雖然因二戰中與英美合作的形勢需要，蘇俄已經於1943年將共產國際名稱取消，但名亡實存，在其指揮下，中共大舉開展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他們利用中國久經苦戰所形成的經濟危機以及其他種種困難來擴大戰亂，又唆使其週邊組織作反美運動，他們底目的是使現政府底力量更為削弱，地位更為孤立，最後終於因不支而垮臺」，這樣「中國便被納入共產國際直接控制的區域或『鐵幕』範圍之內」，如同南斯拉夫「完完全全失去自主自動的能力，一舉一動都得聽命於異族了」。⁶

1948年春夏間，「一舉一動都得聽命於異族」的南斯拉夫狄托（Josip Borz Tito, 1892-1980）政府與史達林之間發生衝突，被蘇俄開除其支配的共產黨情報局。蘇俄和共產黨情報局公開指責南共「已脫離和背叛了社會主義道路」、「採取民族主義立場」，視「蘇聯為侵略國」，號召南共的「健全分子」起來推翻狄托政權。對此，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表示「完全同意」，並「熱烈希望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分子能夠堅決地起來，糾正狄托集團的錯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重新走上馬克思、列寧的軌道」。殷海光非常重視蘇俄對南共的決議和中共對南共事件的聲明，認為這赤裸裸暴露了「社會主義陣營」中蘇俄至上，所有其他共產黨國家不許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只能忠於蘇俄的真相，以及中共作為蘇俄「國際第五縱隊」的「英姿」。⁷此時的殷海光明確站在政府的立

⁵ 殷海光，〈革命與暴動〉，《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5月25日，版2，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8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35。

⁶ 殷海光，〈共產國際底世界政策〉，《中央日報》，1947年5月5日，版3，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8卷，頁29-30。

⁷ 社論，〈中共對南共事件的聲明〉，《中央日報》，1948年7月23日，版2，收入殷海光

場上，主張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齊頭並進，配合運用」，徹底消除「共黨之亂」，⁸認為消弭「共黨之亂」完全不是「國共之爭」，不是內戰，「而是為保衛國家獨立，並為實現政治民主而戰」，⁹且質疑美國在國共之間的和平斡旋，¹⁰反對自由主義者和中間勢力對中共的優容和同情，以及各種「呼籲和平」的舉動。¹¹他斷言人們寄望中共步南共後塵的想法，「只差一點不是白晝做夢」。¹²

殷海光承認，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其他國家共產黨一樣，最初是有解救人類的崇高理想的，「在陳獨秀先生領導之下的社會主義者，當初抱著純潔的熱望，實現經濟平等，將廣大的中國人民從貧困之中挽救過來，並且進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他們為要達到這一個目的，將力量集結起來形成一個組織」。但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中共「與既存的政治勢力發生衝突」而遭到重大挫折，因此激發出了中國社會長期潛伏的「流寇」式暴力，這種暴力正好被蘇俄「國際陰謀集團」所組織和利用，「於是，中國底社會主義運動轉變而為含有國際侵略性質的布林希維克運動。這一轉變，遂使我們底國家陷入長期的紛擾和戰亂之中。而寂寞逝世的陳獨秀先生則是這一可悲的轉變關頭的犧牲者」。¹³這裡所謂「既存的政治勢力」當然隱指的是國民黨，顯示殷海光雖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戡亂」，卻不等於完全認同國民黨。他感覺中共之危險，主要在於依附蘇俄，「進行著滅亡祖國的工程，這是妨害民族獨立」。¹⁴

著，《殷海光全集》，第8卷，頁192。

⁸ 殷海光，〈中國共產黨之觀察〉，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5卷，頁175。

⁹ 社論，〈中共對南共事件的聲明〉，《中央日報》，1948年7月23日，版2，收入殷海光著，《殷海光全集》，第8卷，頁194。

¹⁰ 殷海光，〈馬歇爾底錯誤假設〉，《中央日報》，臺北，1949年8月13日，版2。

¹¹ 殷海光，〈民族失敗主義的一例〉，《中央日報》，1947年10月22日，版3；〈國家分裂主義—民族失敗主義者底方略〉，《中央日報》，1947年12月14日，版2-3；〈與張申府論「呼籲和平」〉，《中央日報》，1948年10月27日，版3。

¹² 殷海光，〈以光明對黑暗〉，《民族報》，臺北，1949年6月19日，版1，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458。

¹³ 殷海光，〈論胡適南來〉，《中央日報》，1948年12月19日，版2，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8卷，頁284-285。

¹⁴ 社論，〈自由主義的新教育〉，《中央日報》，1949年5月14日，版2，收入殷海光著，《殷海光全集》，第13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頁544。

殷海光認為中國國內的戰爭實際上是蘇俄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人類底戰爭是由簡到繁，由局部而趨於全般的」，20世紀發展成世界大戰，全世界的國家在世界大戰中形成兩大陣營，實行「徹底動員國家一切人力，一切物力，一切精神力，一切政治力，加以組織，運用於戰爭之途」的「全民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俄國戰爭觀念更加發展，「比之全民戰爭，更為廣泛，更為深刻，更為不受特定時空限制」，這種戰爭以蘇俄征服世界為宗旨，「在全世界各地廣為佈置第五縱隊」，製造動亂，化國際戰爭為他國國內戰爭，以他國國內戰爭實現俄國國際戰爭的目標，將平時的爭奪與戰時的爭奪相結合，將民族戰爭與階級戰爭相化合，將經濟、政治、宣傳、外交和軍事相混合，將漸進與突進相配合。¹⁵

蘇俄的世界戰爭戰略以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相號召，在這個時期的殷海光看來，實為一個幌子：

到現在為止，許多人還以為共產黨底目的是要「共產」。這是受共黨宣傳影響而造成的最大錯誤。誠然，在現代俄國以及其他支配的某些地區，有著計劃經濟，集體農場，或其他類似共產制度的措施及建設，但是，這些措施及建設至少在現階段的主要目標，與其說是為了俄國和那些國家底人民底福利，不如說是為了從經濟機構和政治組織上統治或部勒人民以對立對內的壓制力量和對外的侵略力量，這從共產政府將人民看作工具，而不當做目的，許多次為了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需要而毫無顧惜地犧牲人民，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實在，共產國際雖然是打「共產」招牌，但是，與其說這與實行「共產」有關，不如說與俄國底擴張目的更有關。¹⁶

殷海光舉出蘇俄在二戰中「將東歐和東北的物質席捲而去」和在占領區對民眾姦淫肆虐為例，堅稱侵略是蘇俄世界戰略的唯一目的。

既然蘇俄以侵略為目的，那麼中共追隨蘇俄，在殷海光的意識中便是「賣國」，消弭中共的戰爭便是保衛國家自由的戰爭。國家自由得以保全，殷海光並

¹⁵ 殷海光，〈四因次的戰爭概念〉，《民族報》，1949年5月22日，版1，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8卷，頁405-406。

¹⁶ 殷海光，〈以光明對黑暗〉，《民族報》，1949年6月19日，版1，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頁459。

不反對——事實上，並且積極主張國民政府應努力「建立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¹⁷

以反侵略論述反共的合理性，並不是殷海光一個人的獨立見解，事實上當時整個國民黨迫於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的流行，也都是從這個理據立論的。掌握國民黨文宣輿論方向的任卓宣（時任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就說：

共產主義除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外，又主張國際主義，要打破國家界限民族界限以共謀共產主義之實現，這就走世界革命底道路了。如果有一個國家先革命，標榜共產主義，任何國家底共產黨都要擁護它，並且勝過於其自己底國家。蘇聯先革命，標榜共產主義，所以各國共產黨都擁護它。國際主義於是變成蘇聯主義。各國共產黨於是變成蘇聯底第五縱隊。中國共產黨因此出賣祖國，變成了漢奸。它企圖把中國納入鐵幕之內。現在它不已在為蘇聯反美，並誓言要中國為蘇聯作戰嗎？這就與愛國不相容，犧牲民族獨立了。¹⁸

任卓宣對於自由主義者從自由民主的角度批評共產黨不以為然，認為「共產主義主張共有財產，以謀經濟上的改革。因此它反對財產自由和貿易自由等等，主張沒收和計畫，以消滅貧富界限，使人人能生活。其與自由主義相反，是很顯然的。自由主義主張自由，當然以自由為基本原則。對於政治要自由，對於經濟也要自由。這就非主張財產自由和貿易自由等等不可了。誰不知道自由主義在經濟上是放任主義不是干涉主義嗎？這便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了。資本主義就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那末用自由主義來反對共產主義，等於用資本主義來反對共產主義。這是右傾，實為一種反動行為。而且失之落後，必然無力」，所以「我們要在這裡來反共，自由主義便顯出了它底不足來。很明白，自由主義，是就個人而言的，不能包括民族獨立之一點」。¹⁹

¹⁷ 殷海光，〈以光明對黑暗〉，《民族報》，1949年6月19日，版1，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頁460。

¹⁸ 任卓宣，〈反共教育的主義問題〉，《中央日報》，1949年5月23日，版2。

¹⁹ 任卓宣，〈反共教育的主義問題〉，《中央日報》，1949年5月23日，版2。

叁、反抗「布林希維克主義」

國共內戰展開之際，殷海光以抗俄論支撐中華民國政府的「戡亂」，抗俄的理據主要放在抵抗侵略的民族主義方面，但也同時提到蘇俄式共產黨國家「專制獨裁」的「鐵幕」統治方式是可怕的，特別於內戰結局漸見分曉之際，談得就愈來愈多了。1949年6月，殷海光在一篇社論中說，蘇俄是一個「政府管理人民底生活之每一方面」的新拜占庭帝國，「在這樣一種極權統治之下，人民不惟沒有行動的自由，而且也沒有思想信仰言論的自由。這是對於西歐文明底一個重大的威脅，也是對於民主世界底一個重大的威脅」。如果中共達成目標，就會使「中國遭逢極權統治的空前威脅。五十年來無數志士仁人捐棄頭顱揮灑熱血所培育的民主幼芽，形將為西伯利亞寒流所摧折，形將為汨濫橫決之赤流所冲毀」。所以開始支持「開展自由中國運動」的動議，希望自由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站出來，「保衛五十年來仁人志士所培育出來的民主幼芽」和「共同抵抗新極權帝國底侵略」。²⁰

殷海光在1949年春已經跟《中央日報》部分人員先期撤退到臺灣，他特別對自由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寄予希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的失望，以及受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拒斥共產主義的堅定態度之感染。胡適對於共產主義和蘇俄的看法，早期以實驗主義立場有所同情和寬容，二戰期間逐漸發生逆轉。俄德對波蘭的瓜分，讓胡適感到蘇俄與德國無異，「可以使歐戰完全變更性質！」（《胡適日記》1939年9月17日記事）²¹ 由此審視到這兩類國家的政治制度，發現俄德同樣具有極權主義的特徵，與英美為代表的民主主義根本衝突。²² 國共內戰時期，胡適對蘇俄亦多所批評，除了認為「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²³ 更主要是抨擊蘇俄的極權政治，批評蘇

²⁰ 社論，〈展開自由中國運動〉，《民族報》，1949年6月30日，版1。

²¹ 賈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79。

²² 胡適，〈民主與極權的衝突〉，《自由中國》，創刊號（1949年11月），頁5-8。

²³ 胡適，〈致周鯁生〉，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12-314。

俄革命採用階級鬥爭的方法，「造成了一種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²⁴ 蘇俄政權「用很冷酷的暴力壓制大多數的人民」，²⁵ 其許諾給人民的經濟自由根本不存在，因為「事實告訴我們，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經濟的自由」。²⁶ 一向堅持「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在大是大非面前，開始大談自由主義，希望將中國導向自由、民主、寬容與和平漸進改革的方向，避免走俄國的暴力與極權之路。

胡適的反俄論述，顯然影響到殷海光。殷於1949年7月在他兼任總主筆的《民族報》上發表〈選擇哪條道路？〉，開頭就引述胡適關於政黨有甲乙兩種類型的說法，稱蘇俄共產黨為「甲種類型的政黨」，這種政黨得勢的國家「一定是獨裁專制極權的國家」，「絕對沒有思想上的寬容，信仰上的寬容，言論和出版的自由；而只有一式一律的口號標語，一式一律的政治教條，只有一式一律的思想方法」，²⁷ 人民被訓練成標準化了的器械，以供政治獨裁者運用自如。他也贊同胡適的主張：中國要走乙種類型政黨政治（即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述「自由中國運動」的提法，事實上正是胡適等自由主義者與雷震等國民黨內改革派在1949年春夏間的動議。殷海光贊同這一動議，也就意味著在思想基調上逐漸將蘇俄的統治方式作為主要抨擊目標。

1949年夏，殷海光離開《中央日報》入職臺灣大學，雖然絲毫沒有影響到他「抗俄」的熱情，但他此後撰寫和發表揭露蘇俄的文章，則主要發表於民間刊物，尤其是他參與創刊的作為「自由中國運動」一部分的《自由中國》半月刊，這使他有了擴大言論尺度的可能。殷海光開始愈來愈集中地以「自由」論述「抗俄」。

在《自由中國》創刊號上，殷海光發表〈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專門分析蘇俄共黨政權如何實現對人民思想的統制，指出「蘇俄統制人民精神生活之嚴密，亦若其統治人民經濟生活之嚴密」，它採取的辦法有二：第一種方法是「用

²⁴ 胡適，〈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華北日報》，北平，1947年8月3日，版3。

²⁵ 胡適，〈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大公報》，天津，1947年8月24日，版3。

²⁶ 胡適，〈當前中國文化問題〉，《自由與進步》，第1卷第10期（1948年10月），頁14。

²⁷ 殷海光，〈選擇哪條道路？〉，《民族報》，1949年7月2日，版1，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頁488-489。

政治權威或陰謀暴力限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研究自由」，「連你肚皮裡悶著想的東西都消滅得乾乾淨淨」；第二種方式是「藉限制甚或消除自由思想來限制甚或消除思想自由」，即消極方面，「他們又控制交通，封鎖電訊，對外形成一鐵幕，對內形成一真空，使內外知識交通阻絕」；積極方面，他們用共黨理論和「謊言」編寫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改寫歷史，甚至自然科學，「替人民建立精神的鐵幕」，以致心理癱瘓而不自知。²⁸

殷海光認為這種「極權統治」正威脅著中國，隨後又在《自由中國》發表〈戰爭與自由〉，指出：「他們不把老百姓當人，隨著自己的喜怒好惡而處置，實行極權、暴力、恐怖的統治，把中國關入鐵幕之中，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所以我們才『反共抗俄』。」²⁹ 他還在其他文章裡，對於作為俄共理論基礎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布林希維克主義」）進行批判，認為其「獨斷的精神籠罩一切」，「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一『惡』，而且是集古今中外萬惡之大成的惡」，其支撐的「暴力恐怖極權統治」違反人性、違反理性、違反自由民主的近代精神，所以必須不惜一切根除它，「我們今日反共的具體內容，就是反布林希維克主義」。³⁰

此時殷海光批評布爾什維克主義，尚未完全否定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而認為「布林希維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不是一回事。以實現『經濟平等』為中心鵠的之共產主義理想，沒有人能夠說它不是大眾所嚮往的」，「在馬克斯主義背後，還有若干成分的『善』。然而，這一多少蘊含著善的主義，一到了俄國，被列寧們用他們的那一套方法來實踐，善的成分一天天地消失，到了史達林之手，『善』便完全消失，而變成十足的萬惡之『惡』了」。³¹ 這與俄國的特殊國情有

²⁸ 殷海光，〈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1949年11月），頁14-15。

²⁹ 殷海光，〈戰爭與自由〉，《自由中國》，第2卷第3期（1950年2月），頁5。

³⁰ 殷海光，〈反布林希維克主義〉，《中央日報》，1950年1月7日，版3，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頁605-606。

³¹ 殷海光，〈反布林希維克主義〉，《中央日報》，1950年1月7日，版3，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頁605、607。此外，殷海光繼〈危害人類的精神狀態〉（《中央日報》，1949年8月8日，版2）提出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種類似於基督教的國教之後，在〈政教合一與思想自由〉一文中更系統地對布爾什維克主義與歐洲中世紀基督教進行比較，斷定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種獨斷的「新宗教」。殷海光，〈政教合一與思想自由〉，

關，「俄國是一個農奴制度、希臘正教和沙皇主義有千年深厚根基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歷史的社會的病症是很深的。西方的馬克斯主義流到這個國家以後，就變成誘發病症和革命暴動的精神動力。為了革命成功，列寧將馬基亞維尼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化合起來，於是而成列寧主義。列寧主義到史達林手上，與對內統治的沙皇主義和對外侵略的大斯拉夫主義化合起來，又成了史達林主義」。³² 威脅中國主要的是史達林式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所以殷海光基本上沒有直接批評馬克思原本的共產主義。

這種認識其實在當時流徙臺灣的知識分子中不乏其人，如胡秋原就寫了一本很有影響的小冊子《中國之悲劇》。其中論及布爾什維克主義，也說「列寧之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距離甚遠」，「俄國共產黨乃是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之混血兒，……而養育於東方正教，專制政治，農奴制度之傳統中的」這個共產主義成為新的宗教，「馬克思是上帝，列寧是耶穌，史達林是教皇，莫斯科是聖地。宗教用良心束縛信徒，而共黨又多了一個紀律制裁」。³³ 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善，到了俄國共產黨那裡變成僅僅是一個外衣，內在的精神則是極端恐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馬基亞維尼主義」）。

但殷海光的思考沒有停留於這一層。隨著他對自由問題關注度的提升，和他對冷戰開始以來西方學界相關理論著作閱讀的增加，³⁴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逐漸

《民主評論》，第1卷第17期（1950年2月），頁14。

³² 殷海光，〈救中國即所以救世界〉，《中央日報》，1949年11月7日，版3，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頁535。

³³ 胡秋原，〈中國之悲劇〉，收入氏著，《胡秋原文章類編》，第1類第9冊（臺北縣：學術出版社，1980年），頁251、257。

³⁴ 1950年代初，殷海光發現二戰結束後幾年內，「由於蘇俄的不斷煎逼和擾亂，促起了歐美思想界普遍的醒覺，許多大學裡優秀的學人起來研究蘇俄和共黨問題」。（〈學術界看布林希維克主義—兼評介漢克遜著《布林希維克主義的政治理論》〉）於是注意在各刊物推介這些著作，如：〈論全體主義及其統治形態—自由民主底最大敵害〉，《自由世紀》，第15號（1950年4月）、〈學術界看布林希維克主義—兼評介漢克遜著《布林希維克主義的政治理論》〉，《自由中國》，第2卷第8期（1950年4月）、〈自由主義的蘊涵〉，《自由中國》，第3卷第3-4期（1950年8月）、〈羅素論權威與個體〉，《民主評論》，第2卷第5-7期（1950年9-10月）、〈洛克底政治哲學〉，《自由世紀》，第20號（1950年9月）、〈第二十二世紀〉，《自由中國》，第3卷第9期（1950年11月）、〈蘇維亞怎樣管制思想〉，《自由中國》，第3卷第11期（1950年12月）、〈民主政治〉，《自

進入了他進擊的視野。有兩本當代思想家論述共產主義的書對殷海光影響特別大。

一本是漢克遜（Hans Kelsen，1881-1973）的《布林希維克主義的政治理論》。³⁵ 這本書的主旨，是從馬克思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解釋一個主張人類大同的無政府主義如何走到極權的國家主義的政治中去。漢克遜認為，導致蘇俄暴力極權政治的，並不完全是俄國的特殊國情或者列寧、史達林的險惡，而是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始終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無產階級解放將促使這種階級壓迫工具消亡，實現人人自由平等的共產社會，但是他們後期又提出「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和無國家的共產社會之間，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渡時期需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以無產階級的國家暴力無情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同時向全社會灌輸社會主義的精神。正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宜之計」，將黑格爾全體主義的國家理論潛入到共產國家，於是蘇俄的「無情制壓」、「毀滅」、「集體訓練」遂公然暢行，與黑格爾的另一信徒希特勒異曲同工。漢克遜的解釋，使殷海光認識到蘇俄向世界擴散的布爾什維克精

由中國》，第4卷第1期（1951年1月）、〈二十世紀哲學〉，《自由中國》，第4卷第3期（1951年2月）、〈追求與幻滅〉，《自由中國》，第4卷第5期（1951年3月）、〈美國八位偉人〉，《自由中國》，第4卷第10期（1951年5月）、〈怎樣擊敗俄國〉，《自由中國》，第4卷第12期（1951年6月）、〈一九八四年〉，《自由中國》，第5卷第2期（1951年7月）、〈極權對於民主自由的威脅〉，《自由中國》，第5卷第5期（1951年9月）、〈文明是怎樣創造的？〉，《自由中國》，第5卷第7期（1951年10月）、〈第三次世界大戰寫真〉，《自由中國》，第6卷第1期（1952年1月）、〈羅素論權力〉，《自由中國》，第6卷第7期（1952年4月）、〈世界之新希望〉，《自由中國》，第7卷第2期（1952年7月）、〈羅斯福夫人回憶錄〉，《自由中國》，第7卷第9期（1952年11月）、〈為害於人類的觀念〉，《自由中國》，第7卷第12期（1952年12月）、〈莫斯科的寒夜〉，《自由中國》，第8卷第5期（1953年3月）、〈美國去來〉，《自由中國》，第8卷第6期（1953年3月）、〈新蘇維埃帝國〉，《自由中國》，第8卷第10期（1953年5月）、〈到奴役之路〉，《自由中國》，第9卷第5期-第11卷第7期（1953年9月-1954年10月）、〈怎樣研究蘇俄？〉，《祖國週刊》，第12-15卷（1955年12月-1956年9月）等。另外，殷海光還翻譯出版《共產國際概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西方之未來》（臺北：華國出版社，1955年）等書。

³⁵ 漢克遜，現多譯為漢斯·凱爾森，是20世紀著名的猶太裔奧地利人法學家，法律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漢克遜於1949年出版*Political Theory of Bolshevism*，自由中國雜誌社成員聶華苓將其翻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漢克遜（Hans Kelsen）著，聶華苓譯，《布林希維克的政治理論：一個批評的分析》（臺北：改造出版社，1952年）。

神，實際上直接源自於馬克思。他接連寫了〈論全體主義及其統治形態——自由民主底最大敵害〉、〈學術界看布林希維克主義——兼評介漢克遜著《布林希維克主義的政治理論》〉兩篇文章，來宣傳他的新認知。

另一本深刻影響殷海光的是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的《到奴役之路》。如果說漢克遜的著作動搖的主要是馬克思後期思想的合理性，那麼海耶克的這本書則將整個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林林總總的社會主義「連根拔起」。海耶克分析道，經濟平等的烏托邦有賴於實行中央計畫的經濟體制，由統治集團決定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和發放，而因市場機制的瓦解，統治集團無從得知正確的供求情報，根本無法做出妥當的決策，來分配資源和產品。分配物資上的不斷失敗，引起統治集團內部對經濟計畫的不同意見，而民眾則容易將失敗歸咎於權力不夠集中，最後，那些看似「可以讓計畫付諸實現」的「強人」在民眾支持下攫取獨裁權力，得以運用高壓的強迫力量以推行計畫。於是，國家無可避免地淪為極權主義，在極權體制下，除獨裁者之外，所有人的經濟和人身自由都將化為烏有。國家社會主義的希特勒德國和共產主義的史達林蘇俄，都是這樣走到奴役之路的。西方國家如果在社會主義運動導引下，放棄自由經濟和自發秩序的趨向，則是在朝專制極權的方向邁進。殷海光讀到這本書後，感到過去在馬克思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困惑「迎刃而解」，原來共產主義和一切社會主義的最初預設就蘊含著極權暴政的結局。這一震動，使他以一年多的時間，逐節譯述這本書，連載於《自由中國》，傳播這一思想。

此後，殷海光的抗俄才真正與反共（共產主義）結合為一，不僅進一步淡化蘇俄侵略的說法，進一步強調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黑暗，且不再將蘇俄及其布爾什維克主義視為共產主義怪胎，也不再將中共比附為蘇俄及其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延伸。他自述反共的理由：「簡單地說，只有一句話：反對極權政治。」³⁶ 殷海光本人成為一個思想上的自由主義者。

³⁶ 殷海光，〈我為什麼反共〉，《自由中國》，第6卷第12期（1952年6月），頁16，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頁750-751。

肆、抗議一切「極權政治」

殷海光的抗俄論，從反侵略，到反極權，理論上抨擊的都是蘇俄，而實際指向的卻都是中共。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立新政權後，雖然很快確定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卻沒有真的變成由蘇俄直接統治中國，或者完全聽命於蘇俄。何況1953年史達林死後，中共與蘇共逐漸開始交惡，發展到1959年的公開決裂，蘇俄成為中共要打倒的「社會帝國主義」。反侵略意義上的抗俄旗幟被中共接替，無論國民黨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便都難於繼續著力於茲。國民黨逐漸將「反共抗俄」替換為「反攻大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則看到中共在大陸立足已穩，與其在口頭上「反攻」，不如實實在在地在臺灣地區建立起現代社會體制，於是將「反極權」從特殊主義的針對共產黨，轉型為普遍主義的針對一切專制政治，國民黨於是也成為自由主義者抗俄論的標的物。

殷海光對國民黨表達不滿由來已久，在南京主持《中央日報》筆政時期，就發表過〈趕快收拾人心〉等言辭鋒利的文字，赴臺初期各種批評更多，但基調都止於怒其不爭。隨著抗俄論向「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深化，殷海光便開始將反對國民黨獨裁與抵禦蘇俄極權政治聯繫起來。在〈反布林希維克主義〉一文裡，他就警告：「當我們賭著國運和布林希維克主義的中國共黨死拼之時，布林希維克主義者卻大搖大擺地在反共陣營中出現，企圖散播布林希維克主義，企圖將反共的忠誠分子布林希維克主義化。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這是多麼危險的事。」³⁷ 這裡警告的，就是當時國民黨內以蔣經國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們主張「在方法上要學習共產黨的」，以列寧式的方式「管制言論」、「統一思想」，以收「集中力量」之效。

韓戰爆發後，國民黨內蔣經國一派占據上風，得以用「列寧主義」模式重建威權，並於1952年底前完成了國民黨的改造。殷海光漸次由警示轉向與國民黨對立。他對於國民黨的威權政治採取嚴厲批判的立場，而批判的立足點便是認定

³⁷ 殷海光，〈反布林希維克主義〉，《中央日報》，1950年1月7日，版3，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9卷，頁606。

國民黨以俄制俄，以共反共。他指出，「在當前反共制俄的進程之中，中國共產黨的名詞術語，頗有流行於反共制俄基地之一的趨勢」，³⁸「他們有一項中心主張，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共』。……共黨講組織，我們就應該以組織對組織；共黨講訓練，我們就應該以訓練對訓練；共黨用機槍大炮打人，我們就要拿機槍大炮還敬」。這樣，「今日反共的民主國家賴以反共的理由會被自己的實際行動抵銷得乾乾淨淨」，反共之戰便變成純粹物理的暴力比賽，世界將變成毫無疑義的相互毀滅。他正告國民黨當局，「反共的國家不僅在國際關係上必須與自由民主國家站在一邊，而且在內政上也必須是自由民主的」。³⁹光明磊落地走上民主大道，才可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不放棄「碼頭獨佔」和「唯我獨尊」的心理習慣，跟在中共後面學蘇俄，便只能是「一個舊時代的殘局」。⁴⁰

為了揭示自由民主「正道」的價值，殷海光借助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自由民主論述和張佛泉新著《自由與人權》所闡釋的原理，詳細論證了「民主的政治組織」與「非民主的政治組織」的區別，⁴¹「獨裁」與「自由」的對立，⁴²「自由」與「民主」的內涵，⁴³「個人」與「國家」的關係。⁴⁴將「個人的人權」看作民主政治的本質，而一切壓制個人權利的「新民主」（集中的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民主）或「舊民主」（君主的民主、指導的民主），均斥之為「民主的贗品」和「反民主的民主」。⁴⁵

1954年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後，反攻大陸已經成

³⁸ 殷海光，〈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自由中國》，第5卷第4期（1951年8月），頁7。

³⁹ 殷海光，〈我們應該怎樣來反共〉，《自由中國》，第15卷第4期（1956年8月），頁3-4。

⁴⁰ 殷海光，〈這是國民黨反省的時候〉，《自由中國》，第10卷第10期（1954年5月），頁4-5。

⁴¹ 殷海光，〈政治組織與個人自由〉，《自由中國》，第10卷第2期（1954年1月），頁5-14。

⁴² 殷海光，〈獨裁怕自由〉，《自由中國》，第10卷第7期（1954年4月），頁11-13。

⁴³ 殷海光，〈民主的試金石〉，《祖國週刊》，第8卷第13期（1954年12月），頁6-10；〈自由的真義〉，《祖國週刊》，第9卷第4期（1955年1月24日），頁6-10。

⁴⁴ 殷海光，〈個人為國家之本〉，《自由中國》，第14卷第5期（1956年3月），頁5-6。

⁴⁵ 殷海光，〈反民主的民主〉，《自由中國》，第16卷第8期（1957年4月），頁3-4。

為一條死路，但國民黨仍然將其看作毋庸置疑的神聖目標。在這一「國策」下，人權自由受到嚴重的妨害，政治向著反民主的道路發展，社會建設停滯，民眾人格分裂，社會文明每況愈下。殷海光對此非常不滿，在1956年《自由中國》推出的「今日的問題」專欄，第一篇即揭開這一「國策」的畫皮。他根據世界人民普遍的心理趨向、武器的發展、國際第三勢力的成長等國際因素，和作為現代戰爭的必備條件人口、資源、科學水準等情況，以及國民黨當局言之鑿鑿而實不行動的客觀實際，斷定「『反攻大陸』的公算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健康穩當的想法應該是「實事求是，持久健進，實質反共」。為此，必須停止打官腔，停止製造精神緊張，以培養持久建設的心理基礎。⁴⁶ 殷海光對美國和西方世界也有不滿，認為他們對自由世界所提供的僅限於武器和金錢，缺乏制俄至關重要的彌賽亞精神。⁴⁷

殷海光愈來愈發現，口稱「反共」的國民黨，實際的思維方式與布爾什維克別無二致，或者殊途同歸。「布爾什維克是極左的，反過來就極右。極左和極右，照羅素說，都是近乎瘋狂的心理」。他以民主、科學的「胡適思想」為參照系，來觀察左方布爾什維克和右方國民黨，發現他們都一直與「胡適思想」過不去，「來自左方的勢力，對於胡適思想，清算洗腦，迫害之不遺餘力，必欲剷除盡淨而後快。來自右方的勢力，提起胡適思想就消化不良，想盡種種方法把胡適思想從人們底記憶裡勾消」。⁴⁸「左方的屬於泛政治主義。右方的屬於泛道德主義。左方的比較著重從現實政治，尤其是在社會基礎上打擊民主。右方的比較著重從倫理基礎或道德的觀點來輕忽民主。二者底立場雖各不同，出發點各異，論據也不一樣，可是，二者對於民主所持取消的態度，則無不同」。⁴⁹其原因，不外左右兩方面的思想在背後有基本的共同之點——都是絕對主義的、權威主義

⁴⁶ 殷海光，〈反攻大陸問題〉，《自由中國》，第17卷第3期（1957年8月），頁7；〈關於「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自由中國》，第17卷第5期（1957年9月），頁6-8。

⁴⁷ 殷海光，〈從衛星放射到彌賽亞精神〉，《自由中國》，第17卷第9期（1957年11月），頁8-10。

⁴⁸ 殷海光，〈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第28本，下冊（1957年5月），頁883。

⁴⁹ 殷海光，〈論科學與民主〉，《祖國週刊》，第9卷第10期（1955年3月），頁8。

的、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群體至上組織至上的、自我中心的；⁵⁰ 國共之間有不共戴天之仇，在心性上卻都深喜二分法：極左的人之看世界，不是貧就是富，不是有就是無，不是友就是敵；極右的人之看世界，不是「道」便是「魔」，不是「正」就是「邪」。⁵¹

所以，國民黨如果要真反共，當務之急是向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民主自由的道路轉型。1958年7月2日，蔣介石在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的談話中表示，「講自由民主的同志們，不要忘記反共復國；反共救國亦不要忘記自由民主」，話雖平正，重點卻在前半句。殷海光認為自由民主與反共復國其實不是兩個問題，「兩者只是同屬今後中國整個發展裡的兩個方面而已。離開反共復國，自由民主的果實不可能壯大；但是，離開自由民主，反共復國根本無從實現」。所以，重點應該放在蔣說的後半句。⁵² 1960年韓國李承晚政權的垮台，殷海光感慨反共、民主、獨裁三者關係失調，是東亞地區出現的一個新的政治問題，一些政權以反共的名義實行獨裁，壓制民主，自己變成黑暗統治。「在反共過程中把民主予以壓制或取消，那麼，反共者與共黨的實際距離，至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反民主的「反共」，根本就取消了反共的理由和目標，真正的反共，就應該走上「民主的反共道路」。⁵³

獨裁政權當然不會因為知識分子的呼籲而放棄威權，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有獨裁之心而乏獨裁之力，到了臺灣，則心依舊而力「有餘」。臺灣的黑暗政治愈演愈烈，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反抗的聲音也愈來愈激烈，最後發展到冒險組織反對黨。殷海光沒有參加組黨，但在思想上卻非常支持有這樣一個力量來制衡國民黨，為黑暗政治消毒。他為在野黨提供的系統建議，歸結到一點，就是「反極權」。雖然後來組黨失敗，《自由中國》停刊，但他沒有停止對國民黨「極權」的憎惡，在去世前留下的遺稿中，精確界定臺灣的國民黨「是

⁵⁰ 殷海光，〈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第28本，下冊，頁883-884。

⁵¹ 殷海光，〈傳統的價值〉，《祖國週刊》，第9卷第8期（1955年2月），頁7。

⁵² 殷海光，〈民主自由是反共的活路〉，《自由中國》，第19卷第2期（1958年7月），頁6。

⁵³ 殷海光，〈「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自由中國》，第22卷第10期（1960年5月），頁4。

打著自由民主幌子的次級極權主義」。⁵⁴

殷海光抵制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國策」，要求「持久健進，實質反共」，不純粹是為反對國民黨大言誤國而言，也有對於「抗俄」、「反共」的真實意涵。他晚年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論及反共抗俄的前景，將共產制度的興亡繫之於動亂與和平的環境演變。他說：「如果世界的大環境長期安定和平，而從動亂中冒出的共產制度還能不由內部的質變而消逝，那才是不可思議的事。」在和平建設下，歐洲的赤潮已經退落；只要堅持和平健進，「亞洲的赤潮豈能長期獨自洶湧？」⁵⁵ 從這裡可見，當殷海光將抗俄論推進到反一切極權的時候，抗俄的途徑也發生了潛變，由過去的武力抗俄發展到和平競賽中「消」俄。

殷海光將抗俄論引申到反對國民黨獨裁，既體現了他思想的進境，也表現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勇氣。在當時的臺灣地區，內心有此覺悟的人可能並不少，但公開加以表達的則主要限於《自由中國》作者群中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傅正等人，以及《民主評論》作者群中的徐復觀等人，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非殷海光莫屬。有趣的是，同樣列名《自由中國》編委會、且擔負過發行人責任的胡適，雖在殷海光思想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進中發揮過引領者的作用，離開大陸以後，適應與國民黨「同舟共濟」的需要，反倒對國民黨獨裁有所容忍。1950年胡適發表〈史達林雄圖下的中國〉，將中共取得大陸解釋為蘇俄侵略擴張進程的一部分。根據黃克武教授的考證，這一長文的基本見解被蔣介石吸收到官方反共抗俄的理論論述之中，⁵⁶ 成為國民黨維持「政權」合法性的重要理據。後來的十多年中，胡適雖然也有爭自由的舉動和努力，但始終不觸及對獨裁體制的否定。⁵⁷ 1954年吳國楨事件發生，胡適為維護國民黨政權的「尊嚴」，憤而斥責吳

⁵⁴ 殷海光，〈剖析國民黨〉，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10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1347。

⁵⁵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下）〉，收入氏著，《殷海光全集》，第2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560。

⁵⁶ 黃克武，〈1950年代胡適與蔣介石在思想上的一段交往〉，《廣東社會科學》，第6期（2011年11月），頁14。

⁵⁷ 何卓恩，〈思想與角色：胡適在《自由中國》的言論解讀〉，《安徽史學》，第5期（2009年9月），頁63-71。

國楨對國民黨獨裁的批評。1956年《自由中國》檢討「反攻大陸」問題，胡適提出這個問題不能碰。

伍、結語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不可避免地被納入兩大世界體系的冷戰之中。對於中國而言，冷戰起初表現為美蘇各自支援一方的國共內戰，繼而演變為國共分別「一邊倒」的兩岸對峙。在此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即使有對蘇美兩個世界均保持距離，希望中國走出一條獨立道路的意見，但是在非此即彼的冷戰格局中也難以堅持。多數知識分子不是親近蘇俄的「共產世界」而排拒「美帝」，就是認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而抗拒蘇俄，態度出現嚴重分化和對立。大致來說，在冷戰初期的十餘年間，親近蘇俄「社會主義大家庭」與認同中共基本上是等同的；認同西方「自由世界」的人在政治上也會追隨國民黨。不過，這種趨勢也並不絕對：1959年中共與蘇共關係破裂，蘇俄成為包括知識界在內的大陸各界聲討的「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反（蘇）修」成為比「反（美）帝」更嚴峻的任務；而在臺灣，則自從1952年國民黨完成重建威權的政治改造後，知識分子再次分化，貼近國民黨疏遠西方「自由世界」者有之，貼近西方「自由世界」而反對國民黨「極權」者亦有之。抗俄的話題仍在延續，其含義則已不可同日而語。

殷海光正是冷戰初期經歷了兩次政治路線選擇的知識分子，抗俄論作為其基本政治論述，內容和側重點有明顯的變化。殷海光抗俄論所經歷的抵抗蘇俄侵略、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抗議一切極權政治的演變，正好體現了中國被納入冷戰體系的過程和冷戰意識形態在東方世界所表現的一些特徵。殷海光抗俄論的演變，既是時間上的三個階段，也是邏輯上的三個層次。大致來說，抵抗蘇俄侵略是內戰進行之前和之中的重點；赴臺之後開始轉為重點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可謂與國際冷戰意識形態接軌；而國民黨改造完成後，焦點逐漸集中到抗議包括國民黨威權政治在內的一切「極權」，彰顯國際冷戰與「西方陣營」內部的複雜性。

徵引書目

一、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胡秋原，《胡秋原文章類編》，第1類第9冊。臺北縣：學術出版社，1980年。

殷海光，《殷海光全集》，第2、5、8、9、10、13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2011年。

賈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二、雜誌、報紙

《大公報》，天津，1947年。

《中央日報》，南京，1947-1948年。

《中央日報》，臺北，1949-1950年。

《民主評論》，香港，1950年。

《民族報》，臺北，1949年。

《自由中國》，臺北，1949-1954、1956-1958、1960年。

《自由世紀》，臺北，1950年。

《自由與進步》，南京，1948年。

《祖國週刊》，香港，1954-1956年。

《華北日報》，北平，1947年。

三、專書

殷海光，《共產國際概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

殷海光，《西方之未來》。臺北：華國出版社，1955年。

郭齊勇，《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

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漢克遜（Hans Kelsen）著，聶華苓譯，《布林希維克的政治理論：一個批評的分析》。臺北：改造出版社，1952年。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

四、論文

何卓恩，〈思想與角色：胡適在《自由中國》的言論解讀〉，《安徽史學》，第5期（2009年9月）。

殷海光，〈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第28本，下冊（1957年5月）。

高飛，〈中亞博弈：冷戰後的中美俄關係〉，《外交評論》，第2期（2010年3月）。

黃克武，〈1950年代胡適與蔣介石在思想上的一段交往〉，《廣東社會科學》，第6期（2011年11月）。

萬青松、王樹春，〈冷戰後的國際格局博弈與中俄關係的發展邏輯〉，《當代世界》，第11期（2018年11月）。